

试论清末川藏边界的变化及其影响

吴彦勤 吕昭义 李志农

(1.昆明高等师范专科学校, 云南 昆明 650031; 2.云南大学 人文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91; 3.云南大学 社科处,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 清末, 在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日趋紧张的情况下, 川边政府越过宁静山边界, 向西经营, 使得川藏正式边界自动失去法律效力和约束力。此后经西姆拉会议上英国的蓄意挑唆, 西藏地方力图向东反弹, 导致民国时期两次川藏战争的爆发。本文将对造成这一结果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

关键词: 清末; 西藏; 边界; 宁静山; 赵尔丰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2003) 01-01-09

清初雍正年间, 清政府划定宁静山为川藏边界。这条边界基本符合了所在地区的历史渊源和所涉川藏双方的利益, 因而在此后的近两百年中, 川藏边界地区是平静的。清末光宣年间, 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在川边主持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在基本稳定川边形势之后, 赵尔丰把目光投向了宁静山以西。随着昌都府及所辖各县的设立, 宁静山边界不复存在, 本不存疑问的川藏边界反成悬案, 这为以后川藏的长期纠纷埋下了伏笔。清政府将川边向西藏境内拓展经营固然有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客观原因, 但总得来说没有顾及到西藏地方的反应和利益, 对民族关系有一定消极影响。本文拟就这一段历史略陈管见。

一 川藏边界的历史形成

传统上, 西藏分为四个部分: 卫, 即以拉萨为中心的地区; 藏, 即以日喀则为中心的地区; 康, 又称喀木、朵甘, 包括今西藏昌都地区和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 阿里, 西藏极西部分。川藏边界的历史形成主要是涉及到康地。溯至唐初, 吐蕃与唐朝并不接壤。在今天的金沙江两岸, 分布着众多的氏羌系统部族。随着吐蕃王朝的强大与东扩, 吐蕃逐渐占据了整个康地, 极盛之时直抵岷江、大渡河。康地的众多氏羌部族文化、语言上逐渐同于吐蕃, 融合形成今天意义上的藏族。然而自公元 842 年吐蕃王朝崩溃, 青藏高原直到被元朝纳入中央版图都再也没有实现内部的统一。在元代, 宣政院统管整个藏地, 但在宣政院以下, 西藏各地行政隶属则有不同。卫、藏、阿里属于“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 康地属于“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和“朵甘思田地里管军民都元帅府”。到了明代, 卫、藏、阿里属于“乌思藏都指挥使司”, 康地属于“朵甘都指挥使司”。虽然元明两代就已对西藏和康地做了行政上的划分, 但由于当时当地社会发展水平等历史条件限制, 在西藏和康地之间并没有具体而确切的边界划分。

公元 1632 年, 康区的白利土司向西占领德格、邓柯、察木多、类乌齐等地, 白利土司和青海的喀尔喀蒙古却图汗以及后藏的藏巴汗势力共同敌视压迫以前藏为根据地的黄教, 黄教势力在东、北、西三面诸敌环视的危急情况下, 远引驻牧于天山南麓的蒙古和硕特部支持。从 1637 年到 1642 年, 和硕特部固始汗率部进入青藏高原, 先后消灭了三地的反黄教势力。其后, 在固始汗的策划下, 达赖、班禅集团分别建立了对卫、藏地区的统治, 而固始汗则成

为包括青、康、藏在内的全藏区的大汗，由此开始了和硕特蒙古与黄教集团共管西藏的时期。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准噶尔势力由伊犁突袭西藏，占领拉萨，杀固始汗之曾孙拉藏汗。清王朝为绥定西藏而采取直接介入已势在必行。

和硕特蒙古势力在藏的灭亡，使康区出现政治真空，盘踞在西藏的准噶尔势力“暗通密信与里塘营官喇嘛，诱伊归藏”^{[1](P210)}，并派五百人进驻察木多。里塘、巴塘正值行军入藏的必经之地，其安危直接关系到进军的顺利与否和后勤粮秣供应的成败。其时，清政府正在对进藏讨伐准噶尔势力进行准备工作，这些动向引起了清政府的关注。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四川巡抚年羹尧奏准派兵进驻里塘。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定西将军噶尔弼、永宁协副将岳钟琪率部由打箭炉进军西藏，途径巴塘、里塘，趁势收服，该地区首领“各呈户口，上纳粮马，革面来归”^{[2](卷1)}。噶尔弼进一步向西进驻察木多，底定察木多周边各地。岳钟琪并派文武官员前往勘察桑昂曲宗各部，划归察木多呼图克图管辖。

西藏平定后，主持四川方面军事的各大员认识到里塘、巴塘在经营西藏事物中的重要性，该地区正值由四川向西藏进行粮秣供应的冲途，有必要由四川方面对其进行节制。加之在战争过程中曾有将该地划归云南的动议，结果丽江土司就迫不及待地向当地人威声恫吓，令其归附云南，由此造成的事端一度影响川省向西藏的军粮运输^{[1](P255)}，由此川、藏、滇之间明确边界和行政管辖分野的工作在战后提出。雍正三年（1725年），川陕总督岳钟琪上奏称：“察木多之外洛隆宗、察哇、坐尔刚、柔噶吹宗（桑昂曲宗、衮卓尔贡觉）部落，虽非达赖喇嘛所管地方，但洛隆宗离打箭炉甚远，若并归内地，难以遥制，应将原系内地土司所属之中甸、里塘、巴塘，再沿近之得尔格特、瓦舒霍尔地方，俱归内地，择其头目，给与土司官衔，令其管辖。其洛隆宗等部落，请赏给达赖喇嘛管理。”^{[3](P110)}。此项建议很快得到清中央的批准，雍正五年“三月，副都统鄂齐、内阁学士班第、四川提督松潘镇总兵周瑛前往巴塘察木多一带，指授赏给达赖喇嘛地方疆界。五月，抵巴塘，会堪巴塘、邦木、与赏给达赖喇嘛之南墩，中有山名宁静，拟于山顶立界碑。又喜松工山与达拉两界，山顶亦立界石”¹。

宁静山，位于江卡、巴塘之间，纵四十余里；喜松工山，又名喜松山，在宁静山北，纵亦四十余里。宁静山—喜松工山一线仅长约九十里，并不涵盖整个漫长的川藏边界，只因其地处冲要巴塘，且立有界碑，因而往往以宁静山代指整个川藏边界。具体说来，宁静山东面的巴塘、德格属川；宁静山西面的察木多、乍丫、贡觉、江卡、南墩、桑昂属西藏。而同样划归西藏的上述地区又因是否属于达赖管理而分两种情况：乍丫、察木多两地，清中央“赏给两处呼图克图管理，自征粮赋，并不纳于国家”^[4]，不属达赖喇嘛管理；江卡、贡觉“系蒙古人，迄今土人尚存有元代制造，乃蒙文，与藏文异”，桑昂曲宗原归察木多呼图克图管辖，本不属拉萨的政教管理范围，清廷“以之赏藏，只于江卡设守备、把总外委各员率兵戍之，为进藏驿站计。藏中派官分驻江卡、贡觉、桑昂，征其粮赋”^[4]。应该说宁静山边界符合了川藏双方的利益，它基本位于拉萨至成都的中点上，略靠近成都，便利双方的行政管理。加之在清代相当长的时间内，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良好，在此后的近两百年中，西藏与四川对此边界都没提出任何异议。宁静山作为一条省级行政边界，成为双方尊重和保护的“宁静”的边界。

二 清末西藏地方与中央、四川关系的新变化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开始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挑战。从道光到同治，英国完成了对尼泊尔、不丹、锡金、拉达克的侵略和控制，将目光投向西藏。光绪二年（1876年），英国借口“马嘉理事件”，强迫清政府签定《烟台条约》，英国取得了进入西藏“探访路程”的权利，引起西藏民众的强烈反对。鉴于西藏民众的态度，清政府对英人入藏也持阻碍态度。为达到侵略目的，英国悍然于1888年和1904年两次武装入侵西藏。在抵抗英军

的斗争中，西藏地方政府和僧俗民众都爆发出高昂的抗战情绪，可清政府出于其一味的惧外心理，撤换了积极主张抗战的驻藏大臣文硕，代之以庸懦无比的升泰。升泰到任后，对西藏僧俗的抗战不仅不予支持，反予压制。由此清政府自身威信下降，西藏地方政府和清中央之间开始产生裂痕。更为严重的是，第二次侵藏战争结束后，英国改变手法，由军事打压转为政治拉拢。英国公使朱尔典、印度总督的派员同流亡北京的达赖喇嘛进行接触，以达赖喇嘛为代表的西藏上层对中央的态度也在发生着变化。

面对英国咄咄逼人的侵略态势，清政府在事实上也对自己的西藏政策进行了反省和检讨。清廷在1906年任命张荫棠“前往西藏查办事件”，张荫棠入藏后首先弹劾了以驻藏大臣有泰为首的一帮驻藏官吏的胡作非为，清廷很快按照他的弹劾对上述人等进行了严办，表现了对张荫棠的充分支持、信任和整顿藏政的决心。张荫棠于1907年正月致外务部电陈治藏刍议，他提出：“窃查印度政府意主侵略，开埠不过表面名词，亟应收回政权，迅筹练兵、兴学各事宜，以图抵制，而杜借口。”^{[5](P167)}并进一步勾画了在西藏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各方面改革的措施。同年，驻藏大臣联豫在上奏中提出：“为今之计，自非改设行省不可，万无疑义。然政贵实行收效，不尚虚声，事以积久而渐非，难期骤革。藏中之事，惟有徐徐布置，设官驻兵，借防英、防俄为名，而渐收其权力。”^{[6](P47)}张荫棠和联豫的意见基本上代表了清中央的意见，面对险恶的国际形势和国内民族关系的新的微妙变化，清中央认识到旧有的西藏政策与体制已不适应新形势，如不再进行变革，恐有落入英帝国主义彀中之虞。

就在此期间，西藏的东邻川边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1904年，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在川边的巴塘重申雍正年间限制寺庙喇嘛人数的规定，以限制寺庙势力，减轻当地人民负担，从而引起引起当地上层喇嘛的嫉恨。凤全在巴塘被围攻和杀害。事件发生后，四川省调派提督马维骥、建昌道员赵尔丰前往镇压。1906年7月，巴塘、里塘动乱平定后，清廷任命赵尔丰为督办川滇边务大臣，由此，川边疾风骤雨般的改革展开。赵尔丰，汉军正蓝旗人，应该说在那个时代，他的确是少有的干练之才。四川总督锡良在上奏内廷保举他时，极尽推重之词：“忠勤纯慤，果毅廉明，公尔忘私，血诚任事。”^{[5](P88)}就任川滇边务大臣后，赵尔丰敏锐地抓住了川边问题的关键，即残暴腐朽的土司统治，以及与土司统治密切相连的落后的农奴制生产关系。在很短的时间内，赵尔丰以秋风扫落叶之势革除川边各地土司统治，派设流官，改革赋役，兴办卫生文教和各种产业。应该说这些措施是有利于川边各族人民的，也得到了受压迫民众的拥护。可其改革势必触犯土司和寺院集团的利益，从而遭到他们激烈的反抗。而赵尔丰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官僚，注定有其历史局限性，他不可能真正发自内心地去尊重少数民族的感情和价值取向。其个人的性格也是明显的暴躁严苛，习惯以强硬手段排除干扰与阻碍。又加之当时川边斗争的确具有艰巨性和复杂性，温和方式很难解决此起彼伏的武装叛乱问题。所有这些因素使毗邻的西藏当局对他产生严重的不信任和不安。

赵尔丰在川边的改革赢得了清中央的赏识。力图全面整顿藏政的清中央很自然地想到主政川边的赵尔丰为派往西藏的人选。1908年二月，赵尔丰被任命为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西藏地方政府和寺院闻讯后，深知赵尔丰主藏政，必会有与川边一样的改革。从四月开始，西藏地方政府派员前往察木多，以“欲攻三岩”^{[5](P230)}为辞（“三岩距巴塘西北，乍丫东北，北界德格，南界江卡。尚不属藏，亦未服汉管”^{[7](P393)}），调集藏兵，意图武力阻止赵尔丰入藏。五月，呈诉驻藏大臣联豫并请代奏中央，“谓赵尔丰仇视黄教，拟请另行简放”^{[5](P210)}。联豫当即予以驳斥，并拒绝代奏。后西藏地方由海道直接递送中央。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西藏地方政府的呈诉中，公然提出“按照唐朝界址，统归于藏”^{[7](P439)}的要求，这种态度加上武力抗拒中央大员入藏的实际行动，西藏地方确实表现出离心离德的倾向。由藏方首先提出的改界要求起了赵尔丰的极大不满：“查阅各禀，远引唐代与吐蕃和亲碑文，俨然自居敌国。”^{[7](P436)}西藏地方与赵尔丰之间的矛盾激化。

三 川边方面控制西藏东部南北两路的经过

光绪三十四年九月，赴藏途中的赵尔丰得巴塘统领罗长禔报：藏方又在江卡聚兵，“明言进攻三岩，暗窥巴塘”^{[5](P245)}。赵尔丰面对此形势，为保证自己顺利入藏，不得不开始调兵遣将：西军左营从正面进击江卡；程凤祥营由盐井进驻江卡西面的扎宜、左贡，截断藏军后路；顾复庆营进取江卡北面的贡觉、乍丫以牵制之。这样，川边方面军队第一次越过宁静山边界，进入西藏。

这时的川边军队入藏，实属驱散拦阻的藏军，保证入藏的客观需要，赵本人此时身兼驻藏大臣和川边大臣二职，藏边两地在其眼中并无太大的畛域之分，还未曾想到将川边领域向西拓展。他在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同其兄川督赵尔巽会衔致陆军部的函件中曾明确肯定：“查打箭炉以西，宁静山以东，纵一千六百余里为边地也。宁静山以西，克什米尔以东，纵约六千余里，横亦三千余里为藏地。”^{[5](P211)}西藏地方政府临时摄政格登池巴七月间稟请赵尔丰，要求将占据左贡等地的程凤祥营撤出，赵尔丰则相应提出由边藏双方会勘界址，以免今后纠纷。他在给赵尔巽另一封致函中谈到他关于堪界的想法：“即如该处从前实皆巴塘之地，久为藏人所侵，又无案卷可查。惟札宜、闷空两处，其协廩皆系巴塘人，尚有此一线可争。”^{[5](P288)}赵尔丰仅是抱着一线希望试图将札宜、闷空两处划归川边，这尚属于比较正常的行政管辖争议。然而形势很快发生了大的变化。

自1904年英国第二次侵藏战争结束后，英军的主力撤出西藏，但在亚东、江孜、噶大克三处商埠以商务委员卫队的名义继续留部分驻军队。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中英签定《藏印通商章程》，其第十二款规定：“凡英国官商在商埠内，及往商埠道中之身家财产，应随时由巡警局及地方官实力保护。中国允在各商埠，及往商埠道中筹办巡警善法。一俟此种办法办妥，英国允即将商务委员之卫队撤退，并允不在西藏驻兵，以免居民疑忌生事。”^{[8](卷4)}英军撤走的先决条件是中国“办妥巡警”，这成为清中央决定派川军进藏的直接契机。当年五月，驻藏大臣联豫表示“窃查藏中现下无兵，以前驻防队营（指绿营——作者注），已窳败不堪；而藏军涣散无几。纵有之，实不堪用。如其训练新军，调官招兵筹饷购械等项事，非二、三年后不能成军。而商埠成立，需兵孔急”^{[5](188)}。清政府决定由四川方面派遣新练陆军一协进藏。

由于西藏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历来西藏行军不难于作战，而难于后勤保障。为了给入藏川军以充分的支援，加之西藏方面对赵尔丰担任驻藏大臣的的强烈反对，宣统元年闰二月，清中央决定卸去赵尔丰驻藏大臣的职务，专任川滇边务大臣，同时决定将察木多、乍丫划归川边管辖，赵本人驻巴塘以遥为藏援。清政府做出察木多归边的安排主要是认为察木多向由该地呼图克图自理，不为西藏地方政府管辖。这样，川藏边界的变更由清中央的这项安排而肇始。

1909年（宣统元年）六月，钟颖由成都拔队西行。西藏地方政府继调集武装抗拒赵尔丰进藏之后，继续调集武装准备抗拒川军进藏，已成公然对抗中央政府的态势。清中央、驻藏大臣、川边、四川各方都认识到不得不使用武力驱散西藏地方政府继调集的武装才能保证川军入藏。而入藏川军系临时招募而成，其协统钟颖又是一个年方22岁的帝戚，从统帅到士兵都未经战阵，所以上述各方决定由川边方面军队负责护送川军进藏。九月，川军抵达藏东的察木多。西藏地方政府在察木多西面的恩达聚兵五千余对峙。赵尔丰于十月初十日移文恩达藏官限期撤兵，二十八日亲赴察木多督师。十一月初，川军、边军分路而进，藏兵纷纷不战而退。川军取道没有藏军部署的藏北三十九族地区西进，边军沿大路西进以吸引藏军，遥应川军。当月，边军向西进驻洛隆宗、硕般多，直至边坝。加之在此前边军就已进驻江卡、左贡、贡觉以及正式划归川边的察木多，这样，西藏东部的北路为川边所控制。

就在边军大张旗鼓地进驻西藏的东北部的同时，另一支边军程凤祥部正悄悄地进行着

一项对藏东南国防有着重大而深远影响的行动。言其影响重大而深远是和当时英印当局的向北渗透的形势分不开的。1905年,年轻而富于冒险精神的威廉森就任英印政府萨地亚政治助理官员,英印当局开始以阿萨姆为基地进一步向北窥视我国西藏的东南边境。威廉森多次亲身深入我藏东南之杂瑜地区调查,收集情报。英印当局还利用亲英的边境土著进入杂瑜调查,并向当地人宣扬“投诚英国,自有许多便利之处”^{[5](P569)}。英印政府关于“战略边界”的帝国主义逻辑使得其不断地在寻求新的边界。如果说工布以西的西藏南部边界有高峻的喜马拉雅山作为天然屏障,英印政府只能对其进行蚕食的话,那么工布以东的西藏南部边界紧紧毗连英印政府控制的阿萨姆平原和缅北山区,在当时的形势下越来越有被鲸吞的危险。光绪三十四年九、十月间程凤祥部由盐井进驻江卡西面的扎宜、左贡后,赵尔丰即指示其部乘势向西相机进取桑昂曲宗。桑昂曲宗在雍正四年“奉旨赏给达赖喇嘛为香火地”后,西藏地方政府设营官管理,下辖左贡、冷卡、昌易、闷空、杂瑜四个协。其中的杂瑜就毗邻英属印度的阿萨姆地区。宣统元年正月初二,程凤祥部进驻桑昂曲宗,藏官事先逃走。二月十四日,程部继续往南进驻杂瑜。西藏东部的南路也为川边所控制。

四 川边正式向西拓界

在边军已在事实上完成对藏东之南北两路的控制后,宣统二年三月,赵尔丰上奏中央,正式提出边藏重新划界的新主张。其所陈述的理由和必要性主要有三点:

1,“中国幅员辽阔,凡于边地,非事羁縻,即成瓯脱。从前闭关自守,四境安,任其悠游于光天化日之下,同蒙覆帔之深恩。乃自门户开放以来,强邻环伺,皆以辟殖民为务,中国遂日受侵夺矣。所有从前属地而未经编籍者,外人即指为彼之所觅殖民地,强为占据。”

从先秦时期的“五服之制”思想开始,中国形成了并始终实践着一套内地与边地采取不同行政方式的制度,即内地的齐民编户的郡县制和控制相对松散的羁縻制。两种行政的共存适应了古代边疆地区与内地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也体现了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对民族地区传统和自治权的尊重;而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临着列强鲸吞蚕食的险恶局面,传统的羁縻制度暴露出它对新的国际形势的不适应性——从主观上说,其相对松散的行政使得国家的主权从外在看显得较为模糊,易予扩张中的强邻以籍口;从客观上说,其必然造成中央在该地区行政、国防能力的虚弱,一旦边防有警,中央驾驭局面的困难很大。赵尔丰以此提出“以现在局势而论,尺寸之土,皆当早为经营,不可再落人后”。

2,赵尔丰在此折中用了相当大的篇幅陈述了杂瑜地区的战略地位和程凤祥所反映的英人图谋:“昨接程凤祥来禀,桑昂曲宗属地杂瑜与猓野番接壤,据该处头人百姓称:前次有英国人曾到其地,由猓野番人引导,该番民等重赂野番,始幸未曾深入。并闻英人见该番民等颇有投赠,此固英人柔软手段惯伎。此次既未深入,安必不复再至。已饬程凤祥驻兵于彼,彰我国徽,以占先著。猓野虽为野番,实亦我之属境。……猓野之南,即阿撒密,闻该处久已附英。阿撒密之南,则为缅甸。猓野之西,为波密野番。英人若得杂瑜,亦与波密接壤,其谋取波密,必无疑义。若得波密,则由工布入藏,仅数日程即与印度联成一片。是以波密一族亦万不可不令归入版图。惟是藏人窃我属地,又复不能自有,若为他人占去一分,我不惟失一分权利,且将受一分侵害”。

“窃我属地”只是表现了赵本人的大民族主义思想和一贯的对少数民族的轻视,可不论;而“又复不能自有”可谓有一定道理。政教合一制度下的西藏地方政府很难有力量抵挡英印政府的渗透,而自宣统二年正月,川军进驻拉萨后,达赖喇嘛就已逃亡印度,寻求英国政府庇护,清政府当即废黜其达赖名号。达赖与中央关系破裂,逐渐走向亲英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清政府来说,更难仰赖西藏地方政府保全疆土。赵尔认为与其如此,不如索性交给川边经营。

3, “英人未一日忘藏, 将来如有利益均沾之事, 必将要索前后藏, 凡属藏之地, 皆将入其范围之内, 早收回一处, 即将来少失一处。且藏番之桀骜不驯, 若一日有事, 必将投外, 野性使然, 亦宜乘机利导” [5](P592-594)。

在清后期英帝国主义侵藏愈来愈甚, 达赖喇嘛、西藏地方政府同中央的分歧和对立越来越大的背景下, 清朝官员在力图改革藏政, 挽回局面的同时, 很多人同赵尔丰一样其实也在心里做了最坏的打算, 即“亡藏”的可能。赵尔丰的逻辑是与其整个西藏被迫丧失, 不如“早收回一处, 即将来少失一处”。不去从整体上解决西藏问题, 却做如此“最坏打算”和下策, 表现了部分清朝官员在面临西藏复杂险峻形势时的张皇失措和信心不足。其结果也只能是进一步加深和西藏地方的矛盾和分歧, 这是我们今天所不能赞同的。

综合上述看法, 赵尔丰最后提出了边藏以乌苏江为界的主张。乌苏江乃一驿站名, 地在前藏, 位于江达之西, 墨竹宫卡之东南。如此, 则是将川边一直推进到了前藏, 这显然是从全局考虑问题的清中央所不能同意的。

四月, 军机大臣庆亲王再给川督赵尔巽的复函中对赵尔丰的提议进行了表态。他首先断然否定了赵尔丰以乌苏江为界的主张: “查上年番众调兵抗阻, 即以察木多改归边辖为辞, 兹若将乌苏江以东全行隶边, 则番众之疑惧更多, 难免不复行煽扰。藏本中朝土地, 藏番皆吾赤子, 属边属藏原无此疆彼界之分。况达赖既经斥革, 尤宜一视同仁, 示以宽大, 不宜过形畛域, 转启猜嫌。”但他也对联豫能否兼顾桑昂曲宗及所属杂瑜地方持保留态度。最后他表示: “来函拟就边兵占领之处, 随宜处置, 不言收, 亦不言还, 自亦操纵之一策。应由尊处密商联、赵两大臣体察番情, 随时妥筹办理。” [5](P645-646)

虽然乌苏江划界的激进建议被否决, 但桑昂曲宗所属地方交归川边经营基本得到默认, 加之先前就划归川边的察木多地区, 川边仍得以越过宁静山向西拓展。宣统二年五月, 赵尔丰奏请察木多设昌都府, 乍丫设察雅县, 恩达、八宿合为恩达县, 类乌齐隶之。此前, 江卡、贡觉两地, 赵以委员管理, 至宣统三年分别改为宁静县和贡县。宣统二年十二月, 桑昂曲宗设科麦县, 杂瑜设察隅县, 同隶昌都府。赵尔丰在这些地区委派官员, 勘定境界, 清查户口, 教化风俗, 并下发《察木多改革章程》, 改革粮赋、乌拉制度, 减轻人民负担。

这样, 从光绪三十四年九月直至宣统二年十二月, 赵尔丰完成了川边向西的推进, 边藏边界从北向南依次在类乌齐、恩达、八宿、桑昂、杂瑜一线。²

五 川边越界经营对川藏关系带来的长期影响

1, 清末川藏边界变化的缘起, 西藏地方政府的错误立场应负主要责任。宣统年间西藏地方政府两次调集武装先后抗拒中央委派大臣和四川新练陆军入藏, 成公开对抗之势, 由此直接导致了川边军队的向西开进; 西藏地方政府更进一步提出“按照唐朝界址, 统归于藏”的不合理要求, 开变界之先声, 使得以赵尔丰为首的川边政府对其失去信任, 最终导致了川边策划并实施越宁静山经营。

2, 需要强调的是, 清末川边的越界经营其性质本为一个主权国家内地方行政边界的变更。而且, 清朝官员的主观动机是为了加强行政, 巩固中央政府的地位, 遏止帝国主义潜在的侵略威胁。尤其在杂瑜地区, 有着非常及时的国防意义。上述地区收归川边后, 实行了一些有利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 减轻人民负担的措施。这些都是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3, 然而, 虽然边藏边界性质属于国内地方行政边界, 但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 它是一条应被谨慎对待的边界。清朝官员用改变行政边界的办法来对待西藏问题是拔苗助长、扬扬止沸的做法, 表现了其对从整体上解决西藏问题的缺乏信心。从主观上讲, 它没有考虑和尊重西藏地方的意见, 引起西藏地方的疑惧, 从而与中央政府的分歧进一步加大; 从客观

上讲，它使得长期以来川藏早已存在的稳定边界——宁静山边界自动失去法律意义和约束力，川藏边界从此成为未定案。民国以后，川藏间的很多纠纷都有边界争议的阴影存在。

川藏传统边界的消失，使得英帝国主义充分地利用了这一点，极尽挑拨中央与西藏关系之能事。1913年十月，西姆拉会议召开。英国方面在会前就挑唆西藏代表在疆域和边界问题上提出主张，据当时英国驻锡金行政官柏尔在其著述中说到：“吾劝其搜集所有关于昔日中藏交涉以及陆续为中国占领，而西藏现今要求归还之各州县等项之文牒，携之赴会。”^{[10](P252)}西藏代表在英国唆使下，提出西藏为独立国，疆域除西藏地区外，还包括新、甘、青、川、滇的各一部分。显然，这样的要求对中国政府是完全不可能予以考虑的，英国也明白这一点，他们所需要的是这种僵局，以使其处于更有利的地位。随后英国以调解人的姿态抛出“折衷”方案，主要是关于内藏和外藏的划分，金沙江以西为外藏，实行“自治”，中国不能干预其政；金沙江以东的巴塘、里塘、打箭炉等地方，也就是整个前川边地方，中央和西藏共管，具体就是“内藏则拉萨之西藏中央政府仍保留其已有之权利，其中包括管理其中大多数寺院，任命各地方长官”^{[10](P255)}。

英国提出的方案将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的关系定位为“宗主权”，理所当然地被中国政府拒绝。但就内外藏的划分来讲，该方案进一步模糊了四川地方与西藏地方的管辖范围的界限，有意将西藏地方中的分离主义势力的注意力向东面引导，为日后的川藏关系，乃至中央与西藏关系打下了一个不和的楔子。

在英帝国主义的这种公然鼓励与支持下，西姆拉会议刚刚破裂，西藏地方政府就在藏东集结兵力，与边军对峙。显然，川藏的这种紧张局势是西姆拉会议上英国挑唆的直接结果，西藏地方政府力图将控制区推进到打箭炉。1917年九月，边军昌都守将彭日升轻率而粗暴地将两名越界的藏兵斩首，在持续了三年的直接对峙后，川藏终于爆发武装冲突，驻扎在川边地区的边军早已朽坏，藏军攻陷昌都，又东向越过宁静山和金沙江，连取德格、邓柯、石渠、白玉、贡县、武城、宁静七县，直至甘孜才为边军血战所阻。此后，昌都及上述七县为西藏地方政府控制。

西藏地方并没有就此止步，此后继续东向干预西康（1925年，川边镇守使刘成勋报请北京政府改川边镇守使为西康屯垦使）事物。1930年，白利土司和大金寺发生因财产债务问题发生纠纷，白利土司和大金寺地在甘孜，属西康辖境，本与西藏方面无关，但因在1918年藏军进攻甘孜时曾得到大金寺的帮助，藏方一味支持大金寺。大金寺也因有西藏为奥援，态度异常强硬，当年六月突袭白利地界，并大肆焚掠。西康驻军在调解无效的情况下，派兵进驻甘孜。德格藏军随即派兵越界进驻大金寺。1931年2月，藏军开始发起攻击，前线康军不支，退至炉霍县属朱倭土司，旋退至炉霍，脱离战线二百多里。如果西藏方面仅是为了大白纠纷这一偶发事件，那么到占领甘孜为止，其军事行动就应告一段落。但藏军没有停止脚步，随后兵分两路，一路南下于五月攻取瞻化县城，再进而进占里塘所属穷坝、霞坝两乡，“并迭谕曲登、崇喜、毛垩各土司速往投诚”^{[11](P129)}；一路向东接受朱倭土司的投诚，进逼炉霍。^{[12](P34)}这一切表明大金寺事件并非偶然，是西藏方面从1917年以来力图控制整个康区的目标的延续。藏军在西康的轻易成功，使西藏地方政府目标进一步膨胀，1931年当年，藏军又发动了向青海方面的进攻。1932年，青海部队反攻，收复了青海的失地，并趁势攻取1918年以来藏军占领的石渠、邓柯等地。占据甘孜、瞻化的藏军被迫撤回到金沙江以西。当年十月，康藏双方签定《岗拖停战协定》，确定以金沙江为双方实际控制分界线，从此，康藏边界问题才逐步稳定下来。

两次川藏战争给西藏地方与四川地方以及中央的关系带来了非常消极的影响，双方的冲突对汉藏人民都是损失。当然，这其中英帝国主义的长期以来的蓄谋挑唆和西藏存在的分离主义势力应负主要责任，然而具体到川藏边界的微观来讲，清末的清中央政府和川边当局的

错误政策也是川藏边界纠纷的一部分远因，川边的越界经营导致了西藏方面的相应的反弹。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对待民族问题一定要从尊重少数民族的传统和情感出发，慎重对待，避免简单粗暴的行政手段。也正是因为做到了这一点，在今天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祖国大家庭内的民族关系才真正实现了平等和互相尊重。

参考文献

- [1] 西藏民族学院历史系. 清实录藏族史料(一)[M]. 西藏: 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
- [2] 陈登龙. 里塘志略[M]. 卷一.
- [3] 张其勤. 清代藏事辑要(一)[M], 西藏: 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
- [4] 西康建省记[M], 乍丫察木多改流记, 江卡贡觉桑昂杂瑜收回记.
- [5]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 上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 [6] 吴丰培. 联豫驻藏奏稿[M]. 卷一. 西藏: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79.
- [7] 吴丰培. 赵尔丰川边奏牍[M]. 四川: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4.
- [8] 张荫棠奏牍[M]. 卷四咨外部呈送中英藏印通商章程请旨批准盖用御宝.
- [9] 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
- [10] 牙含章. 达赖喇嘛传[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 [1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康藏纠纷档案选编[M].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
- [12] 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政协. 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史资料选辑[M],第二辑. 1984.

Comments on Changes and Influence of the Border between Sichuan and Tibet in the Last Qing Dynasty

WU Yan-qing 1, LU Zhao-yi 2, LI Zhi-long 3

(1History Department, General of Kunming Teachers College,Kunming, Yunnan, 650031, China;
2.School of Humanitie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091, China;3.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091, China)

Abstract: In the last Qing Dynasty, relations between the local government of Tibet and central government are strained gradually. Then the border between Sichuan and Tibet lost its legal authentication and binding force. As a result, two battles between Sichuan and Tibet happened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England imperialist's long-term deliberate instigation and the Tibet's splittism inclination were the main reasons. While the Qing government's shortsighted partial policy is also partly responsible for the border dispute

Key words: the last Qing Dynasty; Tibet; border; Ling-jing Mountain; Zhao Er-feng

(责任编辑 晓斌)

收稿日期:2002-12-15

作者简介:吴彦勤(1973-)男,湖北襄樊人,民族史博士研究生,昆明高等师范专科学校讲师,主要研究边疆民族史;吕昭义(1948-)男,云南宣威人,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云南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李志农(1969-)女,云南昆明人,民族史博士研究生,云南大学社科处讲师。

¹ 《卫藏通志》，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2 年“西藏志”“卫藏通志”合刊本，第 519 页。关于周瑛定界宁静山的年份，陈观浔编《西藏志》及不著撰人《西藏志》（为两书）均作“雍正三年，松潘镇总兵周瑛勘定疆址”，与《卫藏通志》雍正五年之说相异，而马少云、盛梅溪纂《卫藏图识》与《卫藏通志》相同。查《世宗实录》于堪界之事有雍正旨“著遣副都统宗师鄂齐、学士班第、扎萨克大喇嘛格勒克绰尔济前往，会同提督周瑛，详细办理”（周瑛于雍正三年升四川提督）。两《西藏志》以周瑛一镇之总兵而膺此大命，于情理不合，于《实录》相殊，今取《卫藏通志》说法。

² 《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1995 年 5 月第一版）“拉里”条目曾有“宣统间改隶川滇边务大臣”之语。不确。乌苏江划界之议止于文牒，枢廷未予首肯。边军护送川军入藏，收服藏东，而联豫趁势设理事官于硕般多。由是硕般多以西仍归驻藏大臣节制。宣统二年七月，赵尔丰致赵尔巽函中有“计开边务现在所辖地面四至程站、里单数：一 东自打箭炉起，西至察木所属恩达止”等语。直至后来傅嵩林任边务大臣，在其宣统三年闰六月的“请建西康行省折”中也明确说道：“边地东自打箭炉起，西至丹达山顶止。”拉里，今嘉黎县，远在恩达与丹达山之西。